

海南出版社

赵铁林讲述

# 即将逝去的记忆

一个家庭

两代人的兴衰沉浮

一部历史

社会生活的民间读本



赵铁林讲述

# 即将逝去的记忆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即将逝去的记忆 / 赵铁林 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5

ISBN 7-5443-0738-7

I. 即... II. 赵... III. 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016837 号

## 即将逝去的记忆

作 者: 赵铁林  
责任编辑: 黄宪萍  
特约编辑: 罗 琳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鹏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宏伟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4.5

字数: 175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0738-7/I · 24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 是我，还是南来北往的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王 焱

### 熟悉的“异乡人”

已经记不得是文革中哪一个秋日的黄昏了，大约是1975年罢，朋友张复带着铁林来到我当时寄居的亲戚家，说，“这是铁林。”放眼看去，只见一条敦敦实实的汉子立在那里。我们从此就算相识了。那时我名义上在陕北插队，实际上待在北京，到处搜求、阅读能够弄到手的各种书籍。当时北京的青年人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文化圈子，从文学艺术、哲学理论到时事政治，关注的中心各有不同。我那时候正耽读黑格尔的书。一本贺麟先生翻译的《小逻辑》在朋友圈里传来传去，翻得稀烂。有时仅仅为了对黑格尔某个哲学范畴的不同理解，莫逆之交也会反目相向，几挥老拳。在这样的氛围中，有时朋友也会带来一些怪怪奇奇的人物。记忆中，有已经写就了十个电影剧本的文学才子，有声称可以一口气用险韵填就二十首《沁园春》的大词人，当然也少不了“指点江山”豪情满怀的未来政治家。铁林就在这时候来到我和朋友们中间。

他长我们几岁。在那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里，有时仅仅差几岁就像是隔了整整一代。铁林那时还在河南新乡工作，到北京来是为他父母的冤案上访的。不久，他通过对调，调到北京的一家工厂做“壮工”。工作不用说是又脏又累，但遇到休息日，他会换上干净的衬衫，挎着一个画夹子，悠悠然去郊外踏青写生。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家世经历。

少年时代的铁林原本属于正宗的“干部子弟”。那时候的这个称谓，并不意味着所有党政干部的子弟都自动属于这一阶层，只有父母一般是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子女，才能享有这种殊荣。不消说，童年的他伴随着鲜花与掌声长大。可是自打1959年以后，“房子越搬越小，汽车越坐越大”，赵家陡然在政治上栽了跟头，后来竟被连降八级，贬斥到河南新乡去当一名基层干部。当文革的狂潮猝起，他那性情刚烈的母亲，一跺脚跳进了木樨地旁的那条河。亲身经历如此的大起大落，铁林叙述起来却不动声色，冷静而客观，好像是在述说古昔年代尘封的往事。

和别的朋友比起来，铁林更像是一位熟悉的“异乡人”。他身上的一部分气质是我们熟悉的；而另一些东西，却让人感到十分生疏。由于他家跌入底层的时间要早上六七年，因而比起京城的朋友们来，不但他的自尊心高度敏感，论为人处世，也要务实得多，成熟得多。他并不热衷发表政治意见，更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他也关心政治动态，不过那更多的是因为这关系到他家的冤案能否得申。底层社会摸爬滚打的磨砺，让他不但精于人情世故，为人行事也十分练达，可以说颇具“世俗的智慧”，甚至让人觉得不无“狡狴”的成分。在我当时接触的人里，林林总总，怪怪奇奇，但像铁林这样的却不多见。他也讲他在河南乡村社会中的亲见亲闻，讲他与底层社会居民的交往，讲他与不公正的命运的抗争。他不好谈学术、谈理论，可能把这视为少不更事的小子们一种精神上奢侈的习气。他迷信学会数理化，可以走遍天下。鲁迅当年曾说过，有谁曾经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之中，那是最能看到世人真相的。正是底层社会的这段人生阅历，构成了他颇为独特的性情气质。

70年代后期，赵家政治上得以平反，家道复初，铁林也考上了工科院校，

将近二十年的艰辛得到了报偿，他终于被重新接纳进自己原来的那个阶层。再遇到铁林时，他踌躇满志，满嘴的理工术语，做着未来工程师的梦，俨然代表新的生产力。我那时正沉溺在哲学理论之中，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渐渐少了，后来便没了往来。

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了。某天我在电视里忽然看到铁林，他正以一位摄影家的身份，给听众讲述他在底层社会的拍摄经历。不觉得让我怦然心动。作为一个“老童生”，当年他的工程师之梦，其实是有些不着边际的。在我看来，所谓“知识人”，其实不是别的，就是那些毕生都在寻求切合自己的一种表达形式的人。他们或以诗，或以文，或出之以理论，或构筑为形象，其实都是为了表达出一己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种种复杂感受与觉解。而铁林带着他的一部相机沉入底层社会，捕捉人生百态，穷神尽相，刻画写照，在我看来，也不仅仅是终于寻觅到了一种适合他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找到了一种适合他生命存在的形式，或者说是终于“成为其所是”。不久我们再次相遇，铁林拿给我看的，就是他这部新近写作的书稿。

## 从“认同”到“承认”

或许是有憾于以往历史学的那种宏大叙事，析离了生命的血肉，蒸馏了淋漓的元气，遮蔽了那些真实个体的悲欢与奋争，致使活生生的历史被风干成了几个干瘪的哲学范畴，成为某些巨型理论观念的粗糙历史图解，二三十年前，国际上兴起一种口述实录体的报告文学，记叙形象、生动而具体，保持了历史的鲜活性，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铁林的这部书，也正是以这样一种体裁写成的自传体报告文学。这里讲述的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在几十年间兴衰升沉的历史，可如同佛家所说的，一粒微尘，可见大千。它也曲折地映现出一部中国的社会史，既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家庭及其子女的生活样态，也有从城市到乡村底层贫民挣扎谋生的艰辛实录，展现了纷繁多样的时代画面。比起那些用宏大叙事写就的正史来，这也是社会记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章节。

---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书是一部双城记，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新乡。在铁林那里，这象征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前一个城市，有着童年温馨的记忆与梦想，到处是鲜花与明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后一个城市，却处处弥漫着灰暗阴郁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沉重的无边泥淖之中，被平庸、琐屑与麻木所包围。就在这两个城市之间，铁林从前程似锦的干部子弟沦为底层社会的一个居民，他的青少年时代一下子断成了两截。

在那个大故迭起，运动不断的年代里，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在政治运动中被从原来所处的阶层中逐出，从而失去了自身的身份，既不被同侪认可，也不被抛入的底层社会所接纳，从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与境遇之中。记得有一部外国电影，记述被纳粹驱逐出德国的一群犹太人，他们的船不被各国接纳，只好在公海上四处漂泊。可是当夜晚来临船上奏响舒柏特的乐曲时，他们都哭了。他们自觉地认同德国文化，但却为无情的德国所拒斥。

铁林那时的处境，就像是那一船漂泊的犹太人中的一员，他在双城之间跋涉的经历，既是沉沦入底层社会后个人挣扎奋斗的历史，也是经历从认同危机再到追求承认自我的历史。

所谓“认同”(identity)，就是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它既指个人与他人所具有的共识与默契，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或阶层的特征所持的肯认态度。老黑格尔当年在《精神现象学》里认为，追求承认是人性构成的基本要素，而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动力，即起源于这种不被承认者要求平等的这样一种“承认的政治”。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则对此进一步具体分疏为“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与“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前者要求异文化身份的人向主流文化认同；后者则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异质文化者的平等身份。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理论中的一大显学。铁林的这部自传，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追求“承认”，即要求承认他与其他干部子弟平等的身份；而按照泰勒的框架，这个故事便成为另一种讲法。

铁林对于那时主流的政治文化并无微词，但家庭在政治上的罹难却把他也打入了另册。他的认同在社会交往之中不被接纳，而最大的伤害其实还是

来自原本属于同一阶层中人，这在铁林的自述中也有记述：一位干部子女这样对她的同学说：

“我还以为赵铁林也是干部子弟，没想到他家里那么破。”这个打击是沉重的……

他的奋斗，本来是追求干部子弟的身份与文化的认同的，但由于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被抛出，他在寻求认同的过程中屡屡蒙受挫折，致使他个人身份的同一性有了裂痕，他的认同出现了危机，处在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之感中。通过自我对一己处境不断反省的精神炼狱，这种边缘化的结果反而渐渐使他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即从追求认同渐次转变为要求社会的“承认”，尽管也许朦胧而未尝自觉。这种“承认”已经主要不再是承认他的干部子弟身份，而是承认他的“自我”所具有的那种本真性：

我头也不抬，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妈的！别“五十步笑百步”，我爸先倒台，你爸后倒台，现在不倒台，将来也会倒台，狂什么？没参加革命以前，这些老干部不也都是平头百姓？转念一想，我也犯不着跟她生气，古往今来，世事轮回，究竟怎么样，还得看自己。《红楼梦》说得好，“纵有千年铁门楣，终须一个土馒头”。只要自己不作贱自己就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何必认真！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他的《词与物》中开篇就谈到，他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读到一部所谓“中国百科全书”，被其中的那种分类法所震撼的经历。在那里，事物被区分为：

〔1〕属于皇帝的；〔2〕涂过香油的；〔3〕驯服的；〔4〕包含在这个分类法中的；〔5〕不可数的……

在这种思维方式与分类法看来，“针戏与诗歌一样好”。福柯说“当我读到这些话时，我大笑不已，正是这笑声，粉碎了我或者应当说我们一切熟悉的标识。……笑声还击碎了所有井然有序的事物的表面，以及我们习惯于用



---

来驯化大量无秩序的事物的平面”。

记得我当年下乡时有位同学，就有着与此相类的荒诞故事。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当做“地主”而批斗致死。事后，却没有任何组织肯证明他父亲确实是“地主”。于是在政治上他便成了一个“妾身未分明”的人，所有的人生出路与就业之门都对他关闭了。那时候他个人奋斗的惟一目标，就是追求到一个明确的地主子女身份，以便能够成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为此他不断地奔波于北京到陕北两地之间，在当时上访的人流中多是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惟有他是要求将自己确定为反动家庭出身的，经过几年不懈的奋斗，这终于感动了他父亲原单位的领导，破例给他开出了一纸确定为地主出身的证明，这才使他如愿以偿。可是几年以后，他的家庭被落实政策，结果又被改回为“城市贫民”身份。但这对于他，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人还是那个人，然而他的身份却几经变易。

福柯的理论脉络甚为复杂，不过他以社会学的“陌生化手法”，揭示了那些曾为我们熟悉的分类标识，其实是依赖于某种人为建构起来的東西，只不过久而久之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人们习焉而不察而已。在这种标识之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被教平了差异，消泯了个性，强制性地加以分类，结果成了单一的社会政治符号。这样的分类与角色的派定，其实只是为了实施规训与控制的方便法门罢了。不过有的人将它视为可以随时脱去的一袭轻纱，有的人却作茧自缚，拿不起，放不下，不但误人，抑且自误，反而成了禁锢自己的螺蛳壳。

不断被边缘化的社会处境，在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一再蒙受挫折，凡此种种，如果不是使铁林由此大彻大悟，至少也使他开始萌生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

一位英国史家在谈及历史写作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喟：“去岁湖上风，既逝矣，渺难追寻。”这是因为写作者以当下之我回首过去之我，时移境迁，未必能说得上是真实的记录。铁林在枚述自身过去的经历时，却采取了一种直言无隐，既不讳言也不虚饰的风格，不敢使当年的经历稍失其真。这令人联想到卢梭的那部《忏悔录》，那也是同样出奇的坦诚，这在恪守传

统道德规范的维多利亚时代，不能被绅士淑女们鄙夷为“心的暴露狂”。但在卢梭看来，即使他的行为不合既定的一般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独特的本真性亦足珍惜。他说，“大自然创造了我，打碎了模子。”铁林在这部书里，也把他在底层社会生活的那些机心与算计，包括他那不无几分粗鲁的情爱与婚姻，毫无讳饰地呈现给世人。这也同样彰显出由追求身份的认同到体认自身本真性的独特价值的心理轨迹。

### “越战老兵”与老三届

三十多年以前，由少数人发端，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这固然不能排除少数人出于在全能体制下养成的投机能力，以“上山下乡”来做政治秀，靠许许多多无名者的奉献铺垫作为自己政治上捞取的资本。但个别人的这些行为，却使大多数人就这样被呼啸裹挟而去。

自70年代中期这些人陆陆续续从农村返城之后，“知识青年”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之中。斗转星移，今天他们身衣各式各样的社会华裘：如“企业家”、“官员”、“学者”……有些人正在成为上升阶层与社会中坚。他们中有谁还愿意重回江湖，去回忆去记叙这一段人生际遇？而更多的人，却因面临失业下岗和家庭困境，自哀不暇，更无暇流连光景，缅怀往昔。几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夫妇访华，出乎我的预料，他们与我一席长谈，主要关注的却是当年的知识青年问题。相比于异国学者，国内读书界无论是有关的研究还是写作，都不免令人汗颜。

尽管“老三届知青”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但艺术的夸饰，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美化，已经把历史上的“老三届”知青弄得面目全非。偶然看到一些名为《丑陋的老三届》、《丑陋的知青一代》之类的文章，甚至认为老三届连相貌都长得特别难看特别丑陋，不免让人发噤。时代的隔膜，竟至如斯。三十多年后回首，无论是当年的“伤痕文学”，还是所谓“青春无悔”的成功人士的独白，或者更年轻的一代出于无知对那

---

个年代的浪漫想像，在关于知青运动历史的主流话语中，一代人或者被误当成革命乌托邦的过时遗产，或者被当成社会主义试验缴纳的“学费”，或者干脆被视为经济改革所急于抛弃的“社会包袱”，凡此种种，都远远遮蔽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

铁林这部书不但上山下乡起始，其中的主要篇幅也涉及这场知青运动，忠实记录和保持了知青生活血肉丰满的原有生态。特别是二十多年后，他重返故地，追踪访问旧时同学的实录，两相对照，将有助于读者对“老三届”知青的历史形象的重新复位。作为老三届，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文革与下放农村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这一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他们永远失去了改善和提高自身命运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不过，也许还是史家兰克说得好，“每个时代离上帝都一样远近。”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一代人各个英俊妩媚，但比起上一代或下一代人来说，也并不更丑陋。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被驱赶到农村去的，尽管他们费尽移山气力，而山河依旧，民众的贫困如昔，但一代人在经受艰苦砥砺的同时，毕竟也为那些从未感受到现代文明气息的穷乡僻壤，吹进了一缕清新的时代之风，带去了新的城市文明的信息，正是这些由无数人付出的这些涓滴的努力，最终才形成了一股促使我们走向开放社会的合力。这也许是为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

历史是无法也不应割断的。如果将这一知青下乡运动，放在近代中国激荡的百年史的大背景之下看，或许我们应当说这是自帝制中国解体以后，重新打造出统一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一个必然历程。有一篇题为《越战老兵与老三届》的文章，在将美国的越战老兵和我们的老三届知青做过对比后，这样说：“我们应当像美国一样客观地对待历史，更加负起社会的责任，认识、帮助和照顾好为了国家建设尽了自己一份力的老三届。他们在从革命到改革的时代的转换中，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样的视角，才显示出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感。

二十来年前一度兴盛的“伤痕文学”，是一种过度偏于主观的文学。它检视批判那个过去的时代，周遭的世界与人物被以堕入底层的“落难公子

“的视角组织起来，用的多是“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式的语式，充满了自感、自哀乃至自恋，而结局不外是才子佳人大团圆。在铁林这样紧贴着粗糙的社会地面，将历历的疤痕与疮痍一起收入眼底的作品之前，不但显得贫血、苍白与稚嫩，作者们也好像是些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儿童。即使仅仅从对于现实生活的描摹着眼，那种文学也显得委实是太小儿科了。

作为一位打捞民间记忆的人，铁林以他的这部书，记录下了那些至今卑微而无公共话语权的当事者，对于文革知青运动的真实记忆，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矫正那些享有公共话语权的人有意无意之间误导的偏向，敞开那些在意识形态压力下被遮蔽的真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的记忆。

对于个人来说，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构成这一自我意识核心的，则是对于自身经历的一切记忆，包括自己的经历、能力、个性等等的总和。打捞记忆正是为了寻求自我认同，找回自我。当历经种种磨难曲折，当年高检家属院中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终于获得承认，被原来的那个阶层再次接纳，可重来的“前度刘郎”还是原来的那个“刘郎”吗？他找回来的那个“自我”，还会是那个“往昔之我”吗？这正是铁林后来不同于那些偶而猎奇的采风者，而能以相对平等的视角去观察底层社会的前提。

## 重回江湖——书外的故事

如果铁林的故事仅止于此，那不过是现代中国又一部“公子落难”其后家道中兴皆大欢喜的老故事，未免稀松平常而使人觉得乏味。黑格尔甚至认为，在承认的政治要求被满足，历史失去张力了以后，不但人物凋零，历史亦将停滞乃至终结。那么当铁林的一切都回复旧观的时候，他是否会体验到某种精神的失重，甚至品尝到失去追求的空虚呢，铁林没有讲。

吊诡的是，二十年后，命运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仿佛和他开了一场大大的玩笑，铁林又落回了社会底层，这已是两度跌落了。经历雪侮霜欺，“身世依然是落花”。不过这次他已不再是落难公子的心态，他终于见到了他以前所见不到的世界。不过这后续的故事在本书中记叙不多，读者可以参见他

的《另类人生》一书，那方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使他的书中，有一种将不同成分杂揉起来的诡谲的融合，形成了某种带恢诡怪奇的风格。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过，“人不仅企望活得更好，而且也企望活得更多。”铁林这半辈子活得好不好，恐怕不同的人会见仁见智，人言言殊，但他确实活得很“多”。他的大半生，升沉跌宕，波澜起伏，算得上是色彩斑斓而丰富。赵家在1959年突遭贬谪，二十余年前家道中兴。到了90年代中期，铁林复又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海南，不想生意失败，再度跌回底层社会。当他落魄海南，流落底层，生计无着，乞食多门之际，还有没有往昔“落难公子”的那种自感自哀乃至自怜自恋的心态，我不得而知。但这却使他的自我认同开始转换了基础，即从一个底层人的视角去观察与思考，而最终成为社会历史的民间记忆的一个记录者。如果没有这几上几下的经历，他也许至今依然懵懵懂懂，随风浮沉，活得不明不白。由此看来，这样的大起大落，作为个体的人生际遇，究竟幸耶，不幸耶？世间人当有能辨之者。

我从书中可以读出两个铁林来。前一个还沉溺于儿女恩怨之中不能自拔，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孰得孰失；而后一个，却已经挣脱了通过个人奋斗去争取“承认”的故事，把他的视角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

“朝与屠沽游，暮从骑卒饮”。他与底层社会的“牛童马走”、风尘女子为伍，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当中，用照相机和笔为工具，忠实记录下他们的离散聚合，悲哀喜乐，那是非具佛家所说的大悲悯心不可的。他既不像当年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将底层的民众加以圣化，以为未来的救世希望全寄托在那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俄国农夫的老羊皮袄上；也从不以那种自居为上等人的轻浮态度去看待众生，以为他们只配在倨傲精英的支配下享受苦难。他的摄影技术，以我非专业的眼光固然无从评判，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的镜头平视，采取的是日常的视角，这与他那清新畅达的文字配合起来，有如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他的文字风格，冷峻明达而又不失温情，刻画入微却能心存悲悯。他告诉我们，尽管政治变幻，人事代谢，历次革命的大潮大涌奔突而至，仿佛使得天崩地解，似乎一个全新的世界马上就要降临，待得尘埃落地，放眼四顾，而风物不殊，世事依旧，其实真正改变的东西却十分有限。

或者用铁林的话说，“层次是永恒的”。而一代又一代的黔首黎民，就这样歌于斯，哭于斯，生存着，繁衍着。这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相比之下，当下充斥书坊的那些“行走文学”也好，或是声称深入底层社会的探察实录也好，其中多数作者其实对基层社会是很难具备“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的。他们更像是一些所谓新潮的“布波族”（Bobos），即真布尔乔亚（Bourgeois）与伪波希米亚（Bohemian）的蹩脚结合——当年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讥嘲地称之为“衣冠楚楚、脑满肠肥的波希米亚人”。他们开着自己的进口车，穿着名牌服装，足等耐克鞋，下去名为体验底层生活，实为新式的豪华游。他们看到的，正是自己要看到的；而他们没看到的，也正是他们所看不到的。

而铁林所走过的那一之字形的人生历程，却使他的精神由此得以升华，使他不但对那个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身份与政治符号，具备了一种初步的自觉，实现了对于自身的超越和新的自我确认，从而不但多少找回了“本真性的自我”，同时也使他在社会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实现了自身独特的社会价值。

所谓“干部子弟”，既是一个政治性的符号，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特定历史的一个派生物，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一代人的逝去，这个标识特定政治身份的术语，也渐渐地快要从字典里消失了。其实，在这些子弟的父母们——那些投身革命的一代人身上，当初并没有这么多政治上的包袱和心理上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情意结。毋宁说他们倒大都是些“好汉不问出身低”的世路上的豪杰。他们的革命原本发端于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可在革命成功后革命者的身份在新社会中却衍化为一种新的“身份政治”，这对于革命所追求的平等价值本身来说，这真是一个颇为吊诡的“观念的悲剧”。所幸，今天的社会终于多少从那里走出，开始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历程。

铁林是满族人，如果远溯女真先祖，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嗒鸣叱咤，则风云易色；横枪跃马，如风虎云龙，好像燎原的烈焰横扫过东北大平原。当他率领八旗子弟立马山海关，行将问鼎神州中原逐鹿之际，何尝想到过自己是不是远离王化的“化外之民”？从这种意义

---

上说，铁林的境遇与其说是跌落尘寰，倒莫如说是回到了父母辈当年投身革命的草创状态，回到了祖先的那种虎虎有生气的生命的本真状态。

记得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曾以一树繁花，随风吹散，有些落到神像上，有些堕入厕溷之中，来说明人的命运。尽管花都是同样的花，但造物弄人，随命运之风的播弄而结果各自不同。借用这个比喻，一种人仅仅因为被南来北往的风吹落到佛头上，便自倨自傲，擅作威福，未免可晒；而另一种人，尽管沦落厕溷风尘，却能透过自我对于生命的不断反省，终能获致人性的丰满。也许铁林尚未洗尽铅华，但几起几落，却使他的生命活出了本色，活得充盈。可惜的是，“江湖子弟人已老，红粉佳人白了头。”

不过，他就这样，行囊中带着残余的一两分“干部子弟价值观”，若干“世俗的智慧”，一些“底层人的脾气”，这些不可思议地汇聚成一处的东西，又上路了，像他当年沉沦社会底层，带着写生的画夹子。

我最喜欢的，还是赵书中引用的魏喜奎的大鼓书的几句鼓词，因为它苍凉沉郁，唱出了命运的诡谲和曲折，也唱出了永恒人生中的悲哀……

春连着夏，秋连着冬，一年四季，刮的是那八面的风。三生石上的老少爷们儿们……肉眼凡胎也要问它个死生……

2003年2月15日

## 让“记忆”不再“逝去”

社会学学者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黄平

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由认识赵铁林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用一个朋友的话说，是“北京地面上的哥儿们”：不修边幅，头发蓬松，属于江湖上的野汉子。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他气喘吁吁拿来一大堆自己多年来跟踪拍摄的打工妹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从艺术摄影的角度说，也属于江湖上的野路子。后来，它们大都集结出版了。从此以后，我记住了一个会用镜头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的人。

现在，我又从他的《即将逝去的记忆》中看到了一个也会用自己的文字讲故事的人。虽然他的故事，并不能完全算是平民老百姓的经历，但毕竟，至少在北京，算是很平凡、很平淡的。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他讲故事的时候，没有我们常常把自己套住的种种“套路”，虽然也有许多大悲大喜，却没有那么多大醒大悟。

我们这一辈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卷进了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正剧、闹剧、悲剧、喜剧。而在北京长大的人，就对“国家大事”看得更多、听得更多、知道得更多、经历得更多。不知不觉



---

之中，总有生在皇城根脚下的气派，即使不是天之骄子，也多少都会在“遛小鸟、哼小曲、喝小酒”之余，把朝廷内外的事情信口说来，虽然说者听者都知道无非是茶余饭后的笑谈，也似乎都还像那么回事。何况，如今讲述自己的苦难遭遇已经成了一种“时髦”，许多眼泪和控诉背后，大都在暗示自己本来是先知先觉的，其实也大多不外是事后诸葛亮之辈。

这种时候来读《即将逝去的记忆》，是有一种亲切感的。不过我想，如果我们都学着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拉拉杂杂”的记忆，就不至于是“即将逝去的”吧。

真希望有更多的小人物来讲讲自己的平凡而平淡的故事。

2003年初春 草于北京朝阳门内